

被忽略的第三世界

● 程映虹

在很多中國知識份子的下意識中，世界意味着西方，而西方又意味着西方學院裏的那些層出不窮的學派。走向世界就是一趟趟地把那些理論背回來譯成中文。這個過程從「五四」以前就開始了，至今仍在繼續。

筆者自1994年出國留學後，有機會經常讀到《二十一世紀》，同時也能經常讀到國內的學術和思想文化類刊物。我在這裏想就自己所感覺到海內外刊物的共同點談一點意見和建議。我想提出一個有關第三世界的問題。就我的閱讀面來說，總的感覺是無論海內外，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在重要的中文思想文化評論刊物的視野之內，有關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歷史和經濟的文章難得一見，思想文化就更不用說了。例如《讀書》和《二十一世紀》就基本上沒有這一類的文章。

中國知識份子的「世界觀」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很多中國知識份子的下意識中，世界意味着西方，而西方又意味着西方學院裏的那些層出不窮的學派。走向世界就是一趟趟地把那些理論背回來譯成中文。這個過程從「五四」以前就開始了，至今仍在繼續。近年來那些起源於語言分析、文學評論和文化批評的西方理論在我們的社會批評理論中影響日增，使得文本的可讀性日益下降。諷刺的是，即使是那些抨擊西方文化霸權和

所謂「文化新殖民」的人，他們的全部修養和知識也仍然是「西方」的。他們用西方人批判自己的理論來批判西方，批判完了再找個西方學派介紹給中國。

當然，這是因為百年來西方文化的強勢使得中國知識界不得不專注於西方，從救國之道到學問，都以西方為重。但這也就帶來了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局限於西方，我們的社會發展理論和模式都是西方的（反西方資本主義的號稱普世性的馬克思主義更是典型的西方理論）；第二，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又是理論重於事實。兩個最明顯的例證是，從清末延續到30年代和80年代延續至今，我們有過兩次思想啟蒙和在知識上「走向世界（實則為走向西方）」的過程，但在這兩次運動中，我們翻譯和介紹的西方材料中，理論遠遠多於事實。在對某個國家的具體歷史發展所知寥寥時，我們卻可以大談其發展道路和借鑒性。例如當我們從20年代就開始「以俄為師」時，當時恐怕連一本像樣的中文版俄國史都還沒有。現代史上

那麼多社會性質論戰，涉及到的都是有關人類社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的大問題，但當時的學者對世界史又能有多少了解？80年代再次開放後，首先如潮水般湧入、而且始終佔主流的是西方哲學和文化批判理論。相形之下，對世界各個地區和文化的真實的歷史進程的全面介紹大為落後。

很多肩負文化交流重任的有思想深度的學者到了海外，關心的總是某個西方理論家有何新作值得介紹或有何舊作忘了介紹，或是最近又出現甚麼新的理論和學派。他們的操勞使得我們一直跟在西方學院那些教授後面疲於奔命。最奇怪的是，在回顧改革開放後的思想發展時，甚至可以用先後介紹或接受的西方理論來劃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對世界的了解處於一種長期的西方和全球、理論和事實的失衡之中。總的傾向是急於從西方發現一種理論或模式，而非對世界歷史的整個發展作全面的考察（而唯一曾經有過的對人類歷史的整體描繪——唯物史觀和社會形態階段論——恰恰又是對人類歷史的最為粗暴的削足適履）。在這種偏向中，思想界對第三世界的忽視是最突出的問題，它和社會上那種天朝心態和強國意識（即總想趕超西方，成為世界的中心，如果不能在經濟和政治上，至少也要在文化的層面上）相輔相成，心理上把自己所處的第三世界視為窮親戚，擺脫得越快越好，就像百年前日本提出「脫亞入歐」一樣。

筆者來到美國留學以後，感觸最深的不是有那麼多我們所不知道的理論，而是有那麼多我們所知寥寥或甚至聞所未聞的事實，尤其是有關第三世界的。美國對這些國家的重視，是只要到圖書館裏走一遭就會有所體會

的。當然很多問題在研究中受到了扭曲，但沒有哪個國家在研究其他國家時會做到客觀而無偏見的，問題是是否真正重視。薩伊德 (Edward Said) 譴責東方主義，這個被批判的對象當然是存在的，但他的批判正是針對西方龐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研究隊伍而言的，其矛頭是研究中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偏見而不是根本缺乏研究興趣。筆者認為，如果中國學術界要從薩伊德的理論中學到一點東西的話，是用他的批判精神對我們自己的西方觀進行反思，對那種片面的反美主義、反西方主義——或者相反，崇尚西方和美國，其表現之一就是不斷地向西方求真理或學問——進行批判。西方人要反思他們的東方主義，而東方人則應該批判自己的西方主義。

中國思想文化界為甚麼應該重視第三世界國家，這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同歷史共命運。但是這個真正的精神和歷史的兄弟卻一直被我們所忽視。如上所述，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在這大半個世紀裏從來就是眼睛向「上」的，難得向「下」認真看看非西方國家。例如我們出了那麼多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和薩特 (Jean Paul Sartre) 的書和文章，但是關於甘地這樣影響了很多西方人的人生哲學和政治信念（如馬丁·路德·金）的東方哲學家，我們出過多少有深度的東西？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值得我們去第三世界尋找的東西就更多了。例如：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改革和革命中，我們能汲取到甚麼教訓和發現多少相似之處？有多少非西方國家像中國這樣熱衷於向西方學習？其結果有甚麼共通之處？自20年代起，第三世界國家出了那麼多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宗教領袖，我們對他們的思想

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在這大半個世紀裏從來就是眼睛向「上」的，難得向「下」認真看看非西方國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對世界的了解處於一種長期的西方和全球、理論和事實的失衡之中。現在，西方人要反思他們的東方主義，而東方人則應該批判自己的西方主義。

身為第三世界重要國家的中國，在有關二十一世紀的前瞻中給了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多大的重視，是值得我們衡量的。作為一點建議，筆者覺得《二十一世紀》應該組織一些專題，把中國放在第三世界的背景下來考察，尤其在過去的教訓、目前的狀況和未來的走向上做一些文章。

了解多少？在何種意義上他們可以和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相比較？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專制主義乃至計劃與市場、效率與公正等等為我們所關心的現實問題，在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是如何一一呈現又相互混雜的？其結果又和它們在西方或者蘇聯東歐的表現有何區別？就發展模式而言，至今只有西方和與西方關係密切的一些非西方國家和地區成功地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制度，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非西方國家仍在摸索，我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到這些地方而非西方去尋找參照（如果不是成功的經驗，至少也有失敗的教訓）？或者，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我們的問題到底是和西方更相近還是和東方更相似？筆者認為，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的思想家和學者從「西方」那裏轉移相當一部分注意力去關注。我們需要給自己重新定位。西方對於我們仍然是重要的，但是我們屬於第三世界。如果說在上半個世紀非西方地區還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發展談不上獨立性，因此我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加上蘇俄）還是情有可原的話，那麼今天的世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第三世界國家佔了多數。我們和它們的歷史、現實處境、遭遇的問題和發展方向是基本相同的。對我們來說，其現實的社會問題和發展道路至少要比西方學院裏那些文學評論和文化批判的教授的理論更重要，更有借鑒意義，更值得翻譯、介紹、評論（這種理論工作當然應該包括西方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評論）。更何況，很多問題其實超越了實用的國與國之間的借鑒範圍而具有全球意義。例如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對東西方關係及其

二十一世紀走向的影響，我想總要超過一打西方學院派理論家吧？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出了本《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討論。贊成和否定的人多從這本書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出發，而忽視了這本書代表西方學術界對非西方文明的關注，它的環球視野，以及它對未來危機的憂心忡忡。在筆者看來，此書在美國問世是必然的，因為第三世界始終在美國學術界的視野之內，其思想和學術界的頭面人物深知它的現狀和發展與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但身為第三世界重要國家的中國，在有關二十一世紀的前瞻中給了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多大的重視，是值得我們衡量的。或許在具體政策和現狀的研究中我們不乏成果，但遠遠沒有上升到像亨氏這樣戰略的、文明的和倫理的高度。

作為一點建議，筆者覺得《二十一世紀》應該組織一些專題，把中國放在第三世界的背景下來考察，尤其在過去的教訓、目前的狀況和未來的走向上做一些文章。國內有很多從事具體研究的人，如社科院和一些大學的有關學者，可以聽聽他們的意見。筆者相信，結果一定會比只請研究西方文史哲的人發言要好。重要的是逐漸改變目前思想界輕視第三世界，或者有關第三世界的研究長期處於經驗性層面或政策研究的狀況。

程映虹 1959年生，現在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撰有《菲德爾·卡斯特羅——二十世紀最後的革命家》。